



徐苹芳文集

明清北京城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
徐苹芳 编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徐苹芳文集

徐苹芳 编著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

明清北京城图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北京城图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
徐莘芳编著.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5
(徐莘芳文集)
ISBN 978-7-5325-6262-6

I. ①明… II. ①中… ②徐… III. ①历史地图—北京市—明清时代—地图集 IV. ①K99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23263号

责任编辑: 吴长青
装帧设计: 严克勤
技术编辑: 富 强

徐莘芳文集

明清北京城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
徐莘芳 编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 (1) 网址: www.guji.com.cn
- (2) E-mail: guji@guji.com.cn
-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插页: 7 印张: 11.5
字数: 220千字 印数: 1-2,300册
版次: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5-6262-6 / K · 1512
定价: 108.00元

目 录

一 文字说明	1
《明北京城复原图》说明书	3
明北京城复原图坊巷胡同地名表	14
明北京城复原图建置资料表	43
清末以来北京风貌图片	99
地名索引	115
附录：汉字简体繁体对照表	139
后记	146
二 地图	149
明北京城复原图	151
清乾隆北京城图	167

一 文字说明

《明北京城复原图》说明书

一

《明北京城复原图》的底图是以 1937 年出版的万分之一《实测北平市内外城地形图》为底本,并根据清乾隆间绘制的《京城全图》中的街巷,按比例改缩而成的。因此,这个底图是清乾隆时期的北京现状。印制时改缩为一万二千分之一。

在目前的情况下,要完全按明代北京城区的原状来编绘,由于资料的缺乏,是很困难的,我们只有从现存的北京旧图中,选出了时代最早、图幅最全和绘制较精确的《京城全图》来作为底图。因而在使用这个底图时,就首先要对《京城全图》作一番考察。

《京城全图》现藏国家第一档案馆。全图高、宽为 14.01×13.03 米,比例约合六百五十分之一,折叠纸本,分装为五十一册。1940 年故宫博物院影缩为二千六百分之一并题为《清内务府藏京城全图》出版,我们所使用的就是这个影缩本。

关于《京城全图》的绘制时代,有人根据图中所出现的建筑物的年代,考定其为乾隆十四、五年间所绘^[1]。然而根据图的内容之详实及其载负量来看,此图自始绘至完成,决非一、二年间力所能及之事。实际上,《京城全图》中某些建置的出现的年代,也是参差不齐、互有先后的。因此,我们认为《京城全图》是自乾隆十四、五年起陆续绘制的,它全部完成的时间,当在乾隆二十六年以前,因为在乾隆二十六年造办处舆图房图目《萝图荟萃》中已有《京城全图》的名称。

《京城全图》就整个图幅来说,画的是相当精确的。但它毕竟不是实测图,局部地方是有误差的。造成误差的原因,除原图绘制时的错误以外,也有是因残损后重加贴裱时的误差。误差最大的地方如宣武门外下斜街老君堂、长椿寺附近,广渠门内细米巷、安化寺附近等,都出现了建筑物方位错乱的情况。凡属此类,在缩绘时都根据地

形图作了校正。蠹蚀太甚的地方,在缩绘时先参考《宸垣识略》的附图及《京师城内河道沟渠图》加以补充,然后则一律按地形图补绘。上述的两种情况,都是个别的,有些是极为细微的,所以我们根据《京城全图》所绘的底图仍是忠实地反映了清乾隆时期北京城区的街巷概貌的。

从明代末年到清乾隆二十五年(公元 1644—1760 年)这一百一十六年之间,北京的街道究竟起了哪些变化呢?这是我们使用这个底图时要首先考虑的问题。

有关的文献资料说明,清朝初期对北京城市的改造是着重在宫城和皇城之内的,特别是对皇城内的改造。首先将明代的“南内”(即重华宫、崇质殿等)、西苑的若干宫殿和许多内官衙署,或废除或改建,使整个皇城内的布局起了变化。其次,又对内城的许多明代的衙署、府第、仓场等作了调整与改建。外城则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在街巷方面,只有个别的地方,因兴建大面积的建筑群而圈占了街道,如兴建雍和宫及其附近的王府时,占用了原来的若干胡同。也有个别的地方,因废弃了明代的大面积建筑群而出现了许多新的小胡同,如天安门前西侧的五军都督府,东直门内的新太仓,天坛北面金鱼池北岸的园林区等,在清初都已废毁,到乾隆年间,在这些旧址之内,均已逐渐析为民居,在自然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许多不规则的小胡同(如新太仓内就出现了九道弯胡同)。然而,不论是废掉的、或新出现的这些街巷,从整个北京内外城的街道布局上来看,也还是局部的、个别的。因此,乾隆二十五年左右的与明代末年的北京街道,只有在个别的、局部的地方有所改变,而其大部分地区仍保存了明代的旧貌。另外,在现存的北京旧图中,也只有《京城全图》距明代最近。所以,我们才决定用乾隆时期的北京现状来作为《明北京城复原图》的底图。

变动最大的皇城部分,则又利用了比《京城全图》时代更早一些的《清皇城宫殿衙署图》作为参考。此图高 2.38、宽 1.787 米,绢本墨画,惟河池树木施深绿色。原藏北京图书馆。刘敦桢先生认为此图绝大部分是康熙二十年(公元 1681 年)左右的现状^[2],比《京城全图》约早六十年。它虽然不如《京城全图》精确^[3],但如西苑内的兔儿山、旋坡台,西华门外的旧监库等处,还都保存了明代的原状,在《京城全图》中这些建筑物均已不存在,兔儿山、旋坡台之地已变为火药库,旧监库则变为昭显庙了。

底图产生之后,在作复原图时又根据有关资料作了相应的修改。凡属明代旧迹,而在乾隆时已析为民居和胡同者,则一律将新出现的胡同删除,如五军都督府、新太仓、朝天宫等。有个别的胡同今已不存,而在《京城全图》中也已残缺,但据明代资料又确知有此胡同者,在复原时则予以补画,如明代河漕西坊的门楼胡同,发祥坊的堂子胡同。

虽然底图是清乾隆时期的现状,但在复原过程中,我们还是根据有关资料尽量使其接近于明代的原貌。

二

复原明代北京宫城和皇城内的建置所依据的文献资料,以《明宫史》为最重要。

《明宫史》是吕毖从刘若愚《酌中志》中选出了第十六至二十卷编辑成书的。这五卷书中的“大内规制”、“内府职掌”两卷,详细地记录了明代崇祯时期宫城和皇城内的平面布局和建置的方位。其后,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六“宫阙·官官·内官监”中所记的内容亦均取材于此,只是多了“宫殿名额考”这一部分。《日下旧闻考》关于明代的宫苑和内官监诸卷,还是以这些为主要资料。

《酌中志》现存有好几种版本,文字互有出入。我们所用的是1963年北京出版社据各本互校后整理出版的《明宫史》。这个本子 in 保存资料与史实方面是比较完善的^[4]。但其中仍有个别的遗漏之处,如记皇城内乾明门南秉笔直房(今北长街北口路东)的一段文字,即未录入。我们在复原这个旧址时,则据海山仙馆丛书《酌中志》补入。

《明宫史》中所记的宫城和皇城内的形制,经与其他资料互相对勘之后,证明它的记述是相当可信的。这当然与作者本人的经历有密切关系。但是,宫苑之内,千门万户,而此书数经编纂,所记个别建筑物的方位,可能仍有误差。如《明宫史》记北海内明太素殿的旧址在陟山门内太液池东岸,但陟山门内地域狭隘,实在容不下太素殿这组建筑,毫无旧迹可寻。高士奇在《金鳌退食笔记》中记太素殿在今五龙亭附近,是比较合理的。所以在复原太素殿旧址时,则按《金鳌退食笔记》所记,不采《明宫史》之说。

《金鳌退食笔记》专门究订明代西苑一带的旧迹。高士奇自康熙十六年以来,即人直内廷,“赐居太液池之西”,对尚存的明代旧迹所阅甚多,复得诸老太监之传闻,故其所记,足资参考。

其他如明代许多大臣游西苑时所写的文章诗词,亦可得到一部分印证。但皆为记游之作,一鳞半爪,且事涉宫禁,难窥全貌,远不如《明宫史》所记之详确。

宫城、皇城部分,既以《明宫史》所记的资料为主要依据,故复原图中所表现的内容,则为明代崇祯时期的现状。

三

关于明代北京内外城的坊界胡同的复原,完全以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以

下简称《胡同集》)和沈榜《宛署杂记》卷五“铺舍·街道”中的资料为依据。

这两种书均非官书,而以个人之力来记述京城内的坊界四至及千街万巷,其可靠性究竟如何呢?因此,就很有必要先考察一下作者的经历及其著书的资料来源。

张爵的生平事迹一直无从查考。1957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永定门外蒲黄榆发现了张爵及其妻王氏的合葬墓,并有长达一千二百余字的墓志铭出土^[5]。根据墓志所述的张爵事迹,与《胡同集》自序的内容及时间,互相对照,完全符合,可证其为一人。

张爵字天锡,别号省庵,又号竹坡。原籍湖广德安府应城县人。明初,其高祖“占籍燕山前卫军役”,所以实际上是北京人。生于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正德间充兴王府书办。兴王朱厚熜被立为皇帝后,以张爵“扈驾有功,书办年久,升锦衣卫,实授百户”。自此以后,张爵一直任职锦衣卫,由百户而升千户、指挥佾事、指挥使。曾在锦衣卫东司房“理刑”,当“东厂缺官理刑时,难其人,金以公举,诏可之。以缉捕功升指挥佾事提督象房。……一切机务,悉倚毗焉”。其人“平居一言一动,悉中矩矱;至所遇虽顺逆不一,而喜怒不形”。因此,可以肯定他是嘉靖时期皇家特务机关里的重要人物,他是“缉捕刑狱”等特务活动起家的。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在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以后曾“掌街道房事”。锦衣卫中的街道房,当是专管京城坊巷街道之事的。这个职务和他后来编纂《胡同集》有直接关系。他在《胡同集》的序中说:“予见公署所载五城坊巷,必录之;遇时俗相传京师胡同,亦书之。取其大小远近,采葺成编”。其所谓在公署所见必录之者,即指掌街道房时从当时的档案材料中录出来的。由此可证《胡同集》的资料来源是出自明嘉靖时期锦衣卫街道房的档案材料。这些材料是当时专为锦衣卫在京城活动时作参考的,大致不会有什么误差。

张爵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辞官归家。“归田来,以琴棋结社,召集朋侪,非订究往迹,则吟咏情性,至于朝政,绝口不谈也”。《胡同集》序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可见在他辞官归家之后,用不到一年的时间,根据以前所录的材料,将《胡同集》整理成书。墓志中所说的“订究往迹”即指《胡同集》的编纂一事。越六年,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卒。

《宛署杂记》的作者沈榜,字子登,湖广临湘人。由举人历知内乡、东明、上元三县。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任顺天府宛平知县。任职期间,苦于无县志可征,乃搜集资料,撰《宛署杂记》一书以备掌故。是书完成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其中所记的“铺舍·街道”应取材于当时宛平县署的档案,也是无可怀疑的。因此,《宛署杂记》所记的宛平县管界内的街道,则是明万历十八年至二十年之间的,比《胡同集》约晚三十年左右。

这两种书虽皆非官书,但同样都是取材于当时官署的档案,这就比凭个人之力来记述的更可靠一些。从现存的资料看,也只有这两种书可作为复原明代北京坊巷街道的依据。根据它们所作的复原图,基本上是可以反映出明代嘉靖至万历时期的坊巷胡同的原貌的。

复原图中坊界的划分,完全依照《胡同集》中所记的为准。但是有个别的胡同方位与坊界有矛盾。如南薰坊的西北角已包括烧酒胡同和锡蜡胡同,然而澄清坊内却又包括了甜水井、菜厂等处,似乎南薰坊所属的烧酒、锡蜡等胡同,成了所谓“飞地”。这与当时坊界划分的一般规律不合。因此,我们在复原图中作了适当的修改,将《胡同集》内所记的甜水井、菜厂等处划于南薰坊内。这种矛盾情况的发生,推测有两种原因:一为《胡同集》原书的疏误。另外,此书未见刻本,目前通行的是刘承干求恕斋据“清内府”所藏抄本录副刊印的,校订粗疏,有明显的误字^[6],因此也有可能是求恕斋在传抄和刻印时有与原本不符之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根据有关的地理方位来对有矛盾之处作必要的修订。

《宛署杂记》中所记的坊界,与《胡同集》有所不同。这说明在明代嘉靖末年至万历二十年以前这三十年间,宛平县的坊界曾经改划过。但为全城统一起见,我们仍按张爵所记的为准,没有按沈榜所记的坊界改动。所以,复原图中的坊界是嘉靖末年的情况。

街巷胡同的名称,也以《胡同集》所记的为准。宛平县所属的各坊内,则据《宛署杂记》作了补充(在“坊巷地名表”中一律加☆号)。另外,也有极少数的胡同是根据其他资料复原的(在“坊巷地名表”中一律加△号),如日忠坊的八步口,见于《帝京景物略》卷一“千佛寺”条内;黄华坊内的本司胡同则见于《日下旧闻考》所引的《析津日记》中。

至于胡同的方位,除古今名称相同,方位相沿未变者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古今名称不同,或方位在今天的地形图上难以排定的,我们则首先根据《京城全图》的胡同注记,作了复原;《京城全图》未注记的又根据《宸垣识略》的附图及清末《京师城内河道沟渠图》的注记作了补充。

北京街巷胡同命名的来由,大致有下列数种情况:(一)根据一条主要的街巷或胡同进行排条的,如棕帽头、二、三、四条等。(二)根据主要的地物地貌命名,如大桥胡同、臭沟胡同等。(三)根据主要的建置命名,如隆福寺街、奶子府等。(四)根据有关的工商作坊和市场或住在这条胡同内的人物命名,如粉房刘家街、骡马市街、石驸马街等。(五)根据街巷的形状命名,如斜街、半边街等。命名以后,口头相传,不一定有什么文字记录。日久天长,命名的本意不清楚了,或旧的地物、建置及有关的行

业,人物不存在了,就发生了以讹传讹或重新命名的情况。因此,我们在复原明代街巷胡同名称和方位时,也必须从两个方面加以考虑,一方面是新旧名称之间有直接继承关系的,这在北京胡同的名称中占主要部分,举例如下:

1. 字异音同的。这是由于后来的记录者不明命名的本意,而据口传的字音书写的。如大时雍坊内的卫营胡同,《京城全图》标为喂鹰胡同,今作未英胡同。

2. 转音的。主要是口传日久,字音转变而成的。如仁寿坊内的喇嘛杨家胡同,乾隆时即转为喇叭营,今称利溥营;北居贤坊内的杨二官胡同,《京城全图》转为羊管胡同。

3. 省略简化的。如金城坊内的巡按察院胡同,《京城全图》即省略为按院胡同。

另一方面,新旧名称之间没有直接继承的关系,这在北京的胡同名称中,从明代末年至乾隆时期虽然不占主要部分,但在复原过程中,也是必须予以注意的。推其原因,是由于胡同中出现了新的内容,旧名称已不符合实际情况,而必须重新命名的。如河漕西坊的大桥胡同,原来是因为其东口外正对驾于河漕上的南大桥而得名,到清代初年,祖大寿曾居此,所以就改成祖家街了。又如发祥坊的白米寺街,《京城全图》改为松树街;崇南坊的安化寺街,至乾隆时也已废除。但是,我们仍可据有关的建置及地望予以复原。如上面所举的大桥胡同、白米寺街及安化寺街,正是因为南大街、白米寺、安化寺等有关的建置俱存,虽然其新旧名称不同,但仍可复原其旧称。

在复原图中,我们标注的街巷胡同名称,绝大部分是肯定无误的。也有一少部分是推测的,或与原位有所出入,凡属此类,在图中均标红色注记,以示区别。

《胡同集》与《宛署杂记》所录的街巷胡同名称,也还有一部分根本无法推测其原位的。它们以南薰坊的崇文门里台基厂以南,北居贤坊的东北城角内,朝天宫西坊的西城墙下等区域者居多,而这一带也是胡同形状改变较大的地区,目前尚没有办法作出复原。

四

关于建置旧址的复原,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用了哪些参考文献?它们的参考价值何在?第二,如何对建置的旧址进行定点定位?前者是确定所收各类建置的项目内容、兴废年代及大致方位的依据;后者是要说明我们用了哪些方法把各类建置比较正确的表现在复原图中。

全部参考文献的名称、版本等,见所附的“参考文献表”中。复原宫城、皇城所用

的《明官史》、《金鳌退食笔记》等已见前述,此不再赘。这里要说明的是除正史、实录之外的其他参考文献。按其时代,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 明代文献:

复原图中绝大部分的建置均见于此类文献。前述《胡同集》和《宛署杂记》中也记录了一部分各坊内的建置,特别是《宛署杂记》卷十九中记了许多寺观的名称和兴建年代,有些是从来不见于其他文献的。此外还有:

1. 于奕正、刘侗《帝京景物略》八卷。书成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其中所记的北京景物都是崇祯初年的情况。它详细地记载了当时比较著名的园林、寺观的方位景物,为我们复原明末北京的私家园林的分布,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2. 孙国敕《燕都游览志》四十卷。已佚。清末缪荃孙尚见此书刻本(见光绪《顺天府志》卷一二二,《纪录顺天事之书》)。清初朱彝尊编《日下旧闻》时曾大量引用,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就是这部分引文,大约有一百二十余条。它对当时各类建置的方位记得很详细,并转录了一些碑刻资料,是明末记录北京景物的重要文献。

3. 万历《顺天府志》六卷,沈应文纂。书成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颇为简略,远不如与其同时的《宛署杂记》,但它却记录了顺天府属的许多地方衙署的方位。

4. 《寰宇通志》,陈循纂。书成于景泰中。成化间的《明一统志》即据此书重修,顺天府这一部分几乎没有什么改动。其中所记的许多官署方位较详于其他文献。

5. 明代的碑刻资料。有些建置的兴建年代在文献上没有明确记载或互有矛盾时,则参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的一部分北京的碑刻拓本。所以许多建置的兴建年代则均以碑刻所记的为准。

其他零散的明代文献,大部分已收入《日下旧闻考》。

以上所举的明代许多参考文献,绝大部分均属万历至崇祯时期的,这大体上与坊巷胡同的时代相当。

(二) 清乾隆时期以前的文献:

1. 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和《天府广记》。这两种书都是清代初期系统地记录北京历史旧迹的著作。特别是《春明梦余录》更详记明代诸事。作者本人久居北京,为崇祯间进士,曾作过明朝的刑科都给事中。他熟悉明代的典章制度,尤其对明代末年的北京情况更是熟悉,因而《春明梦余录》是研究明代北京的重要文献。

2. 《日下旧闻考》一百三十卷。书成于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是根据《日下旧闻》重新编排增删而成的。为现存官修的材料最丰富的专门考订北京历史的著作。它特别以记明代诸事最为详细,除了博引当时所存的明人诗文集及各种笔记书

之外,还有以下两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书中大量引用了当时尚存在的许多明代碑刻资料,而这些最原始的资料现在已大部分佚失。第二,修此书时,去明代未远,许多有关的旧迹尚可寻按,从书中按语所记的情况来看,纂修者确曾作过一部分实地调查。所以,在《日下旧闻考》中所记的明代旧迹,除有个别错误外,绝大部分都是正确的。在复原图中,有很多建置的旧址都是以《日下旧闻考》为依据而进行复原的。

3. 吴长元《宸垣识略》十六卷。书成于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是根据《日下旧闻》和《日下旧闻考》两书的内容,以“采掇大纲,事详语略”的办法编辑而成的,并附简略的地图十八幅,以备观览。作者是留心北京掌故的人,也曾作过实地调查,所以对《日下旧闻考》的不确不尽之处,均作了纠正与补充。所附的地图,虽然简单,亦可补《京城全图》之残缺。

乾隆时期的参考文献,其时代正与《京城全图》的时代相同,两者相辅,为我们的复原工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 清代末期及近代的著作资料:

清代末期比较重要的著作,有缪荃孙等纂修的光绪《顺天府志》和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他们距明代虽已甚远,但是新资料的出现和撰述所侧重的方面不同,也为我们提示了若干线索。如《顺天府志》中专记水道及桥梁的部分,就比《旧闻考》的资料集中而详备。《京师坊巷志稿》原是为《顺天府志》中坊巷部分而作的,备录北京各大小胡同的名称,并罗列了有关该胡同的全部资料,颇便翻检。

在近代的著作中,我们还参考过陈宗蕃的《燕都丛考》和朱偁的《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等的有关部分。另外,还利用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关于北京现存寺观庙宇的一部分调查档案。

在对各类建置旧址进行定点、定位时,采用了下列方法:

(一) 今尚存在而一直没有改动的建置,一律按地形图上所标的方位与范围表示。如钟鼓楼、鸣玉坊的帝王庙、仁寿坊的隆福寺,皇城内的皇史宬等。

(二) 今已不存而见于《京城全图》者,一律按《京城全图》中所示之方位与范围表示。如发祥坊的白米寺、日中坊的瑞云寺、大时雍坊的华石桥、阜财坊的萧家桥等。

(三) 今已不存的建筑群,但知其旧址所在的大致方位,而从地形图上的胡同中尚可辨认出旧址范围的,则按考定的范围表示,并将旧址内的小胡同一律删除。如大时雍坊内的五军都督府、南居贤坊的新太仓、河漕西坊的朝天宫、皇城内的内官监等。

(四) 今已不存的建筑群,虽知其旧址的大致方位,但从地形图的胡同中尚难肯定其旧址范围的,则暂按推定的范围表示,旧址内的小胡同亦暂保留,以示区别。如阜财坊内的三法司、皇城内的都知监等。

(五) 今已不存的建置,虽知其旧址的大致方位,但它的范围与现存的胡同不发生联系的,则根据《京城全图》所绘的建筑形式进行推定。如保大坊的礼仪房、金城坊的内西巡捕厅、屯马察院等。

(六) 今已不存的建置,虽知其旧址的大致方位,但它的范围与现存的胡同不发生联系,而在《京城全图》中又无迹可寻的,则据文献所记的方位,并以与其有关的地望关系进行推测,只标注记,不示范围。如泡子河及积水潭附近的许多私家园林。

在复原图全部建置的定点、定位中,以(一)、(二)、(三)类占绝大部分,(四)、(五)、(六)类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因此,从整个图面上来看,还是大体上把我们已知的明代各类建置的方位,比较正确地表现出来了。

根据以上所述,复原各类建置所用的参考文献既然绝大部分是属于明代万历以后的,因此《明北京城复原图》中所表现的各类建置也大部分是万历以后至崇祯时期的。但是为了参考的方便,也将少数后来废掉的早期重要建置的旧址标了出来,如宫城内的六科廊。凡在早期建置的旧址上后来又改为其他建置者,一律都标改建后的名称,而将旧名称作为附注,如日忠坊内的供应厂,附注为大慈恩寺。

五

以上是对《明北京城复原图》的底图的编绘、坊界的划分、街道胡同和各类建置旧址的复原等问题的简单说明。总括如下:

- (一) 底图绝大部分是乾隆时期的。
- (二) 坊界是嘉靖末年的。
- (三) 街道胡同的名称是嘉靖末年至万历中期的。
- (四) 宫城、皇城是崇祯时期的。
- (五) 内外城中的各类建置是万历以后至崇祯时期的。

因此,《明北京城复原图》所表现的时期是明嘉靖末年至崇祯时期(公元 1560 年—1644 年)的。

1964 年 5 月初稿

1965 年 12 月改写

注释

- [1] 曹宗儒《清内府藏京城全图年代考》，故宫博物院《文献特刊》，页 37—38，1935 年。
- [2] 刘敦桢《清皇城宫殿衙署图年代考》，《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六卷二期，页 106—113。
- [3] 此图在某些细部上画的极为粗疏，如宫城内竟将文华殿这组建筑全部遗漏。
- [4] 见北京出版社 1963 年排印本《明宫史》的出版说明。
- [5] 见北京市文物工作队 1964 年 12 月编印的《北京市出土墓志目录》第一编，页 29，编号 103，库藏号 096。首题“皇明诰封昭勇将军锦衣卫管卫事指挥使致仕省庵张公暨配淑人王氏合葬墓志铭”。孙桧撰，朱天俸书，戈九章篆盖。志石 72 厘米见方。志文尚未发表，承示拓片参考，特此致谢。
- [6] 南薰坊内乌蛮驿误作乌马驿，正东坊内蒜市口误作菜市口，正西坊内余家胡同误作徐家胡同，崇北坊内万福寺误作万神寺，崇南坊内的东南巡捕厅误作东西巡捕厅，宣北坊误作宣化坊，宣南坊内盆儿胡同误作益儿胡同，阎王庙误作关王庙，教忠坊内剪子巷误作翦子巷，金台坊内郎家胡同误作邢家胡同，酒醋局外厂脱厂字。

参考文献

1. 《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张爵，1922 年求恕斋刊本，简称《集》
2. 《宛署杂记》二十卷，沈榜，1961 年北京出版社铅印本，简称《宛》
3. 《明宫史》五卷，刘若愚原著、吕毖编次，1963 年北京出版社铅印本，简称《宫》
4. 《帝京景物略》八卷，刘侗、于奕正，1963 年北京出版社铅印本，简称《景》
5. 《长安客话》八卷，蒋一揆，1960 年北京出版社铅印本，简称《长》
6. 《燕都游览志》四十卷，孙国救，《日下旧闻考》所引，简称《燕》
7. 《永乐大典本顺天府志》八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艺风堂抄本，简称《永志》
8. 《寰宇通志》一百十九卷，陈循，《玄览堂丛书》续集本，简称《寰》
9. 《万历顺天府志》六卷，沈应文，中国书店影印万历二十一年刻本，简称《万志》
10. 《明史》，张廷玉等，中华书局缩印百纳本廿四本，简称《史》
11. 《明会典》，明万历十三年重修刻本，简称《典》
12. 《明实录》，影印江苏国学图书馆传抄本，简称《实》
13. 《北游录》，谈迁，1960 年中华书局铅印本，简称《北》
14. 《春明梦余录》七十卷，孙承泽，古香斋袖珍本，简称《春》
15. 《天府广记》四十四卷，孙承泽，1962 年北京出版社铅印本，简称《天》
16. 《金鳌退食笔记》二卷，高士奇，1963 年北京出版社铅印本，简称《金》
17. 《古今图书集成》，1934 年中华书局影印本，简称《图集》
18. 《日下旧闻考》一百三十卷，于敏中等，清乾隆内府刻本，简称《考》
19. 《宸垣识略》十六卷，吴长元，清光绪宝林堂刻本，简称《宸》
20. 《人海记》，查慎行，昭代丛书本，简称《人》

21. 《同治畿辅通志》三百卷,李鸿章等,清宣统二年北京官报印刷局石印本,简称《畿》
22. 《光绪顺天府志》一百三十卷,张之洞、缪荃孙等,清光绪十二年刻本,简称《光志》
23. 《天咫偶闻》十卷,震钧,清光绪三十三年甘棠转舍刊本,简称《偶》
24. 《京师坊巷志稿》二卷,朱一新,1962年北京出版社铅印本,简称《稿》
25. 《燕都丛考》三编,陈宗蕃,1930—1931年中华印字馆铅印本,简称《都》
26. 《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朱偁,1947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注:在“建置资料表”中引用上述诸文献时,一律用简称。简称之后先标明卷数,再标明页数(不分卷次的则直接标明页数)。线装古籍则以A表示上半页,B表示下半页。各种文献的卷、页,一律以参考文献中所列的版本为准。